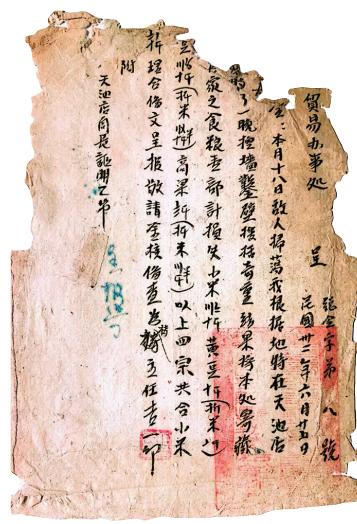


文物无声，历史有痕。

本期《文博》聚焦几件抗战文物，它们或藏于民间，或展于厅堂，共同勾勒出三晋大地上可歌可泣的抗战画卷。柯璜先生刻石立碑印制传单，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担当；一份记载政府损失情况的报告，展现了娄烦地区全民抗战的真实图景；一幅军事地图，见证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段史实；一封插着鸡毛、十万火急的“鸡毛信”，体现了烽火中传递情报的智慧；《侵略者的命运》木刻漫画，以艺术为投枪，揭露了侵略者的狂妄与必然败亡的命运。

——编者



静乐县贸易局办事处呈报县政府损失情况的报告(作者供图)

这份藏品是1943年6月18日，日寇在静乐县六区一带（今娄烦县天池店乡）“扫荡”后，静乐县贸易局办事处呈报县政府损失情况的报告。原件为麻纸毛笔书写，高22厘米，宽14厘米，边缘有少部分残缺，但意思基本可通，原文为（标点为作者加）：

贸易办事处 呈 总会字第八号  
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 
□□①鉴：本月十八日，敌人“扫荡”我根据地时，在天池店□□②了一晚，挖墙凿壁，搜括（利）奇重，结果本处寄藏□□③家之食粮一部，计损失：小米三十七斤，黄豆十斤（折小米六斤），□④豆三十五斤（折小米二十四斤半），高粱八斤（折小米三斤半）。以上四宗共合小米七十一斤，理合备文呈报，敬请鉴核备查为祷。主任吉一叩。  
附 天池店证明二纸  
呈报 7月18日

注①推测为“县长钧”三字，合为“县长钧鉴”，即报请县长审批。末尾“呈报7月18日”应为局长签字，表示文件已上报处理。虽然贸易局长和办事处主任同为吉一，但手续应该如此。②推测为“驻扎”或“骚扰”。③推测为寄藏粮食的户主名字。④推测为某种颜色的豆类名称。

“为祷”是敬辞，书信结尾用语，表示请求、盼望或祝愿的意思。

间长为村的下一级“间”的长官。因娄烦境内大部分村庄住户不多，所以许多村庄间长就相当于村长。

这份材料，是娄烦县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记载日寇“扫荡”的文字证据。

1937年10月，中共静乐县委和中共静乐二区（娄烦地区）区委成立。1939年3月，日军占领静乐县城，中共静乐县委迁到娄烦。当时，日军经常外出“扫荡”，给娄烦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。在中共静乐县委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，娄烦军民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。

1941年初，为了扭转根据地物资匮乏的局面，迅速搞活经济，扶持生产，以保证军民正常生活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贸易局，张静山任局长。1942年7月，吉一任局长兼办事处主任。这份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就是当时在娄烦发生的事。

当时，县委、县政府及其下属单位都是游击办公，所有钱币由工作人员保管，货物、粮食等无法随身携带的财物寄藏在老百姓家中。这份材料生动呈现了娄烦地区全民抗战的真实图景，群众不仅慷慨捐钱捐粮支援前线，更不惜冒生命危险为政府保管抗战物资。日寇“扫荡”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报告中所提到的损失并需要注销的，只涉及民主政府的公粮，群众的损失难以估量。由此可见，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抗日民主政府的财务管理仍然是十分严格的。

## 依靠人民群众

张贵桃  
强建生

## 严格财物管理

1937年10月，中共静乐县委和中共静乐二区（娄烦地区）区委成立。1939年3月，日军占领静乐县城，中共静乐县委迁到娄烦。当时，日军经常外出“扫荡”，给娄烦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。在中共静乐县委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，娄烦军民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。

1941年初，为了扭转根据地物资匮乏的局面，迅速搞活经济，扶持生产，以保证军民正常生活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贸易局，张静山任局长。1942年7月，吉一任局长兼办事处主任。这份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就是当时在娄烦发生的事。

当时，县委、县政府及其下属单位都是游击办公，所有钱币由工作人员保管，货物、粮食等无法随身携带的财物寄藏在老百姓家中。这份材料生动呈现了娄烦地区全民抗战的真实图景，群众不仅慷慨捐钱捐粮支援前线，更不惜冒生命危险为政府保管抗战物资。日寇“扫荡”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报告中所提到的损失并需要注销的，只涉及民主政府的公粮，群众的损失难以估量。由此可见，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抗日民主政府的财务管理仍然是十分严格的。

这组四格漫画采用从右至左的叙事顺序，粗犷凌厉的

刀锋线条勾勒出简洁而极具张力的画面。四幅作品依次刻画了日本侵略者从“妄图征服地球”的野心膨胀，到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”的暴行肆虐，继而“遭遇抵抗仓皇惊恐”，最终“彻底溃败致地求饶”的完整轨迹，以直观易懂的画面，深刻揭露侵略本质，昭示正义必胜、侵略必亡的历史铁律。

蔡迪支是抗战时期活跃于桂林的重要木刻家。1938年武汉沦陷后，他辗转桂林，加入“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”，投身救亡宣传。彼时的桂林作为大后方文化中心，汇聚了欧阳予倩、徐悲鸿、巴金等千余位文化精英，形成了以报刊、展览、戏剧为载体的“抗战文化城”。木刻艺术因制作简易、传播迅捷，被鲁迅誉为“顷刻能办”的革命利器，成为文化抗战的主力军。艺术家们以刻刀为笔、木板为阵地，创作了大量揭露侵略暴行、唤醒民众斗志的作品。

《侵略者的命运》诞生于1939年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。作为战时重要的宣传载体，此类木刻作品常被批量印制于报刊、传单或制成布画张贴街头，成为刺向敌人的匕首、唤醒民众的号角。



《侵略者的命运》(桂林博物馆藏)

## 侵略者的命运

钩 希

在晋祠博物馆的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——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艺术展”上，蔡迪支创作的木刻漫画《侵略者的命运》深深吸引了我。

这组四格漫画采用从右至左的叙事顺序，粗犷凌厉的

# 烽火石刻与抗战传单

郭 悅



《正气歌》石刻(山西博物院藏)

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烽火岁月中，教育家、艺术家柯璜以笔为刃，将文化血脉筑成抗战的精神堡垒。几件穿越硝烟留存至今的文物，不仅是他艺术的结晶，更是其民族气节的铮铮铁证。

### 《正气歌》石刻 民族魂的永恒铭刻

1931年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，随即铁蹄践踏东北。时任山西省图书博物馆馆长的柯璜愤然挥毫，以四页巨幅行草书写下文天祥的千古名篇《正气歌》。完成墨稿后，他自费将其勒石，并朱拓900余份，分赠予全国师长以上军官及各界名流，期望以浩然正气唤醒军民抗敌之志。1937年太原沦陷前夕，柯璜将石碑密埋于太原文庙地下，携家人赴重庆避难。这一埋藏，让石碑在日本铁蹄下奇迹般保存下来。

2025年初，这块尘封88年的石刻在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特展中首次公开展出。斑驳的刻痕间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诗句依然激荡。

该碑石书法以行草书写，单字高约15厘米，整体气势磅礴，融合张旭之狂放、怀素之奔逸，董必武曾评其书法“浑灏流转，穷极笔势”。

### 抗战传单 纸上的烽火号角

抗战期间，柯璜以诗文为枪，创作《告三岛士民歌》——寇陷南口在太原作《豕人骑狮预言歌》《述平绥正太同蒲平汉陇海浙赣道上见闻八首》等文，痛斥日军暴行，并自费印制传单，宣传抗日。

《告三岛士民歌》创作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，时值日军攻陷南口（位于北平西北45公里处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会处，为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，是北平通向西北的门户），太原危在旦夕的生死关头。在太原防空洞中，柯璜以悲愤之笔写下这首长诗，将其视作“毛锥亦矛戟”的文化武器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，并呼吁日本民众“悬崖勒马”，否则必“自取灭亡”。诗中他痛斥日本政客、军阀与浪人集团的狂妄野心，直指其侵略行径，并预言其终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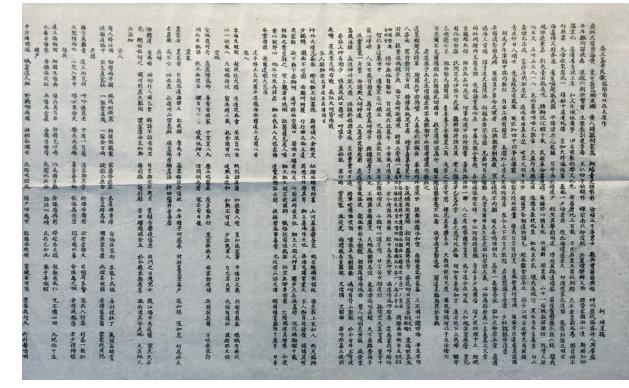
受历史严惩。

1938年，日本侵占中国更大面积的国土。柯璜在前往重庆途中创作了《豕人骑狮预言歌》（下简称预言歌）。他以沉睡狮王隐喻中国，以猪隐喻日本，记叙一头自不量力的猪跳到狮王背上企图侮辱狮王，结果狼狈丢掉性命，再一次预言中国抗战必胜。这是他运用书画特有的形象思维而创作的诗歌，此预言歌首先登载于《大公报》和《抗战诗坛》上，全国其他地区报刊争相转载，重庆国民政府将此歌印成传单，在敌占区空投。

《述平绥正太同蒲平汉陇海浙赣道上见闻八首》创作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柯璜从太原避难重庆途中。诗中“平绥、正太、同蒲、平汉、陇海、浙赣”等铁路线串联华北、华中和华东，覆盖了当时中国主要的战略交通网络。柯璜以亲历者视角，描绘了日军入侵后沿途城镇的残破景象、难民流徙的惨状，以及军民抗战的片段，具有强烈的纪实性。该组诗为八首，分别为《寇人》《空城》《农家》《吴妇》《富人》《老弱》《伤兵》《积尸》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1931年，柯璜将其印制的传单直接邮寄给日本天皇和时任首相犬养毅，试图以道义警示日本当局。犬养毅收到传单后，曾回信赠诗柯璜：“百虑谋犹拙，一言迷自开……忌心都去尽，何复病尘埃。”诗中隐含对柯璜劝诫的认可。1932年5月15日，犬养毅因反对主战派遭刺杀身亡。

柯璜的抗战贡献以文化为根基，融合教育、艺术与学术，形成独特的“儒者抗战”模式。他通过刻石立碑、书画义卖、分发传单等形式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抗战动力，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担当。



抗战传单(山西博物院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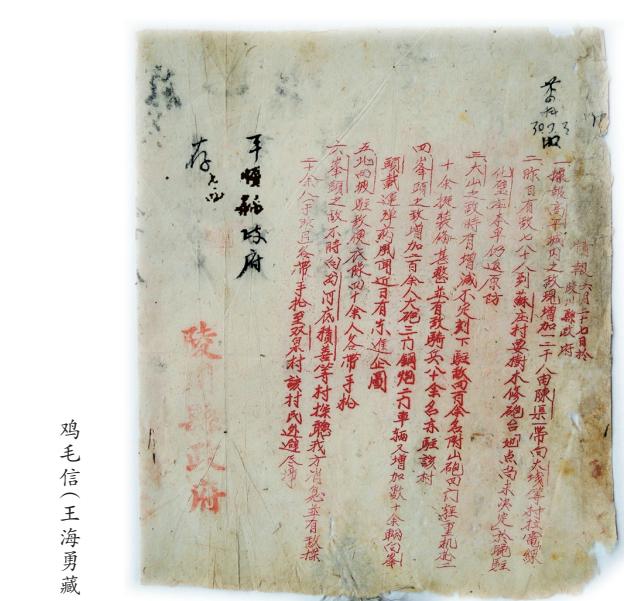
在山西省图书馆正在举办的“三晋烽火 红色印迹——文献里的山西抗战展”中，一封泛黄的麻纸信件放置在展柜中。这封信高26.3厘米、宽22厘米，麻纸，朱墨油印，文字竖行，边角残破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信的下方斜插着一根鸡毛。这封1941年的鸡毛信，曾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最紧急的情报。

这封信属于民间红色文献收藏家王海勇，其情报内容发自陵川县政府，没写具体送达方，故发往对象应不止一处。在此信件左上有毛笔手写“平顺县政府”等字样。

由信件内容可知，此封信是1941年6月27日从陵川县政府发出，同年7月3日，亦即一周后平顺县政府第四科收到，并于次日交政府存档。

鸡毛信是抗战烽火中传递情报的特殊形式，其名始于1939年“晋西事变”后的太行山区。面对日军封锁导致的情报滞后，彭德怀、黄克诚等将领在总结经验教训后，创新提出“以鸡毛为信使”的紧急通讯方式。信封上插一根至三根鸡毛，分别代表不同级别的紧急军情，无需邮戳邮票，见羽如令。黄克诚曾赋诗赞其：“鸡毛传期遇，相约斗日闻”，这种源于山西牺盟会的土办法，迅速成为各根据地的“千里眼”。

平顺与陵川均为太行根据地的核心区域。1941年，正值根据地极为艰难的岁月，敌人对根据地军民实施惨无人道的“三光政策”与“囚笼政策”。但在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的坚强领导下，根据地军民通过精兵简政、减租减息、大生产运动及强化党的领导等系列举措，成功克服困难，突破敌人封锁，不仅收复失地，更使革命力量持续壮大，逐步实现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变。在此过程中，传递情报的鸡毛信亦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

鸡毛信(王海勇藏品)

## 一封鸡毛信

王 荣